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知识分子的鸦片

Raymond Aron

[法国]雷蒙·阿隆 著 吕一民 顾杭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知识分子的鸦片

Raymond Aron

[法国]雷蒙·阿隆 著 吕一民 顾杭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的鸦片 / (法)阿隆(Aron, R.)著;吕一民,顾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2701-3

I. ①知… II. ①阿… ②吕… ③顾… III. ①政治思想史-法国-现代 ②知识分子-研究-法国-现代 IV. ①D095.655 ②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015号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by Raymond Aron
Copyright © 1955-1983 by Editions Calmann-Lev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Calmann-Levy
through Madame Feng Chen, C. E. R. 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338号

书 名	知识分子的鸦片
作 者	[法国]雷蒙·阿隆
译 者	吕一民 顾 杭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ions Calmann-Levy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701-3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te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①,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会

^① 该书由伽利玛出版社收入“随笔”文丛,并在1955年出版。

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在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编 政治的神话	1
第一章 左派的神话	3
怀旧的神话	4
价值观念的分离	9
政治体制的辩证法	15
思想与现实	21
第二章 革命的神话	31
革命的含义	32
革命的威望	38
反叛与革命	47
法国的形势是革命的吗?	54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神话	62
	无产阶级的界定	63
	理想的解放与真实的解放	68
	理想的解放的诱惑	73
	真实的解放的单调乏味	80
	论政治乐观主义	88
第二编	历史的偶像崇拜	95
第四章	圣职人员与信徒	97
	党的永远正确	98
	革命的理想主义	105
	审讯与招供	111
	论一种所谓的革命正义	118
第五章	历史的意义	126
	意义的多样性	127
	历史的单元	133
	论历史的目的	140
	历史与狂热	146
第六章	必然性的幻觉	152
	偶然的决定论	153
	理论性的预测	159
	历史的预测	168

论辩证法	173
论历史的控制	181
第三编 知识分子的异化	191
第七章 知识分子及其祖国	193
论知识分子	195
知识分子和政治	202
知识分子的天堂	208
知识分子的地狱	217
第八章 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	224
重要事实	225
国家的争论	228
日本知识分子与法国模式	235
印度与英国的影响	240
第九章 寻求一种宗教的知识分子	249
经济观点或世俗的宗教	250
积极分子与同情者	253
从公民宗教到斯大林主义	259
世俗的教权主义	266
知识分子的命运	275
结论 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283

第一编
政治的神话

第一章

左派的神话

左派与右派两者之间的抉择还有意义吗？谁要提出这一问题，就立即会有可疑分子之嫌。阿兰曾如是写道：“当有人问我，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左翼人士与右翼分子之间的鸿沟是否还具有意义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向我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肯定不是一位左派分子。”我们不必因这一禁令而裹足不前，因为它暴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对以理性为基础的信念的爱慕，毋宁说是对偏见的依恋。

根据利特雷词典的说法，“左派”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该党的议员坐在议长的左侧”。然而，该词所表示的意思与“反对”并非相同。各个政党会轮流上台执政，但左派政党即使执政，它依然还是左派。

在强调“左派”与“右派”这两个术语的意义时，人们并未满足于指出，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围绕着一个不断受到动摇的中心，往往会形成两个彼此对立的集团。人们会提出：或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或者存在着两套概念，这两套概念之间的对话通过词汇翻新和制度的变化始终进行着；最后，或者存在着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充斥于数百年来编年史当中。除了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想像之中，除了被德雷福斯事件的经验和选举社会学的颇值

得怀疑的解释所滥用,这两类人、两种哲学、两种党派还存在于其他地方吗?

在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代的左派,其口号和纲领也在变化。而且,昔日为宪政而战斗的左派与当今在人民民主政体中表现出来的左派难道仍有某些共同之处吗?

怀旧的神话

法国被认为是左右对立的故乡。当“左派”、“右派”之类的术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仍很少出现在英国的政治语言中时,它们在法国早已取得了合法身份。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

根据时下流行的看法,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 in 法国显得格外严重。旧制度的统治者所遵奉的世界观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则指责权威的原则,似乎后者既是教会的原则,又是王国的原则。进步党(*le parti du mouvement*)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同时与王权和教权展开斗争。进步党之所以倾向于反教权主义,乃是因为教会的等级制度有利于,或看起来有利于抵制进步的党派。在英国,宗教自由显然是发生于17世纪的大革命的原因和结果,故此,其先进的党派更多地保留的是独立派、非英国国教派、激进派等基督教派别的痕迹,而不是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的痕迹。

法国在实现从旧制度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绝无仅有的突然性和野蛮粗暴的色彩。在拉芒什海峡的另一边,宪政制度是逐渐地建立起来的,代议制亦产生于其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习俗的议会。在18、19世纪,民主制的正统性在君主制并未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取代了它。与此同时,公民之间的平等亦逐渐地消除了等级差别。尽

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但是法国大革命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它们有时在英国却实现得比法国还早。在英国，“民主化”成了对立的党派的事业。

法国大革命，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藪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法国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这种经典的解释并没有错，但是，确切地说，它只道出了一半真相。在所有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这两种类型的人（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法国人皆属于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奥梅对本堂神甫，阿兰与饶勒斯对泰纳与莫拉斯，克列孟梭对福煦。在某些情况下，当冲突尤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的时候（如围绕着教育法、德雷福斯事件或政教分离所发生的冲突那样），往往会形成两个阵营，而其中的每一个阵营都以公认的信条作为基础。然而，同样应当强调指出，两个阵营的理论本质上是怀旧的，它的作用是掩盖导致各所谓的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种种不可调和的争论。不管是各种右派，还是各种左派，他们均无法共同执政。正是这一点，构成了1789年以来法国政治史的特征。“左派”的神话只是对1789和1848年的一连串失败的虚拟性的补偿。

直至第三共和国获得巩固之前，除了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之间的几个月，19世纪的法国，左派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由此也

造成了左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混淆)。左派反对复辟,因为它自认为是大革命的继承者。左派从大革命中获得了各种历史上的称号、过去的光荣的幻想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但是,尽管如此,“左派”仍如同它所仗恃的异乎寻常的事件一样,含混不清。这种怀旧式的左派只具有神话中的统一性。从1789年到1815年,左派从未有过统一性。1848年,当奥尔良王朝的垮台使共和国得以填补宪政的真空时,左派同样并不具有这种统一性。我们知道,右派也同样不是铁板一块。1815年时,君主派分裂成极端派与温和派,前者梦想复辟旧制度,而后者则接受既存事实。路易—菲利浦的登基使正统派处于“在国内流亡”的境地,而路易—拿破仑的上台亦不足以使奥尔良派与正统派和好,尽管他们同样地仇视这个篡位者。

法国19世纪的内部纷争重现了使革命事件具有戏剧性特征的那些冲突。君主立宪制的失败导致了一种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出现,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失败导致了共和国的出现,而共和国则又第二度退化为实行全民表决的帝国。同样,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之间无情的争斗最后均让位于一位被加冕的将军。这些派别不仅代表着为拥有政权而你争我夺的群体,而且他们在法国政府的形式、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改革的规模等问题的看法上均各执己见。希望在法国建立一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君主主义者,仅仅是在仇视旧制度的这一点上与那些梦想在法国实现平均财产的人相一致。

在此,我们无意去探究大革命为什么会具有灾难性的过程。G.费雷罗在其晚年热衷于阐述两种革命,即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的区别。前一种革命力图扩大代议制,并确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种革命是由正统原则的崩溃引起的,同时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统性。费雷罗的这种区分颇令人满意。建设性的革命几乎可以与我们的予以好评的各种事件的结果融为一体:代议制、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反之,破坏性的革命则得为恐怖、战争和专制统治承担责任。人们不难设